

复旦中国文学史 传统研究

苏永延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复旦中国文学史 传统研究

苏永延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中国文学史传统研究/苏永延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

ISBN 978 - 7 - 5633 - 6520 - 3

I. 复… II. 苏… III. 文学史—研究—中国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110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 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 56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开本: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10.25

字数:24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传统研究书系

陈思和 周 斌 主编

甲种：《名师名流》

乙种：《复旦剧社与中国现代话剧运动》

《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复旦中国文学史传统研究》

《陈望道对复旦语法修辞学科的贡献》

责任编辑 / 杜桂玲

责任质检 / 张 静

丛书总序

复旦大学中文系自 1925 年建系，悠然八十，人才辈出，自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一批在国内外学术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教书育人，薪火相传，创建了许多有特色、有影响的学科，形成了有特色的学术流派。同时，复旦大学的校园文化也有悠久历史，复旦诗社、剧社等文学团体为新文学运动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现经中文系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编辑一套研究丛书，在学理层面上总结探讨复旦中文系著名学者的治学经验和特色学科、文学社团的历史传统，以求弘扬复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继往开来，进一步加强中国语言文学各个学科的建设，并以此纪念复旦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和中文系建系八十周年。

本丛书分为甲、乙两种：

甲种本《名师名流》为著名学者的研究专辑。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系以来，拥有许多杏坛名师、学术名流，他们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之大旗，追求无所羁绊的学术境界，他们中间有《共产党宣言》中文本的翻译者陈望道先生，有诗文并茂才华横溢的刘大白先生，有自称不京不海不江湖的陈子展先生，有清华国学院的传人蒋天枢先生，有学者、编辑、翻译家兼于一身的赵景深先生，有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的洪深先生，有著名新文学作家和翻译家夏丏尊，靳以，方令孺，谢六逸等先生，是他们开创了思路开阔、学风活泼、新旧相济、研究创作并重的中文系学术格局。1950 年代全国院系调整，中文系受惠多多，与整个复旦大学一样，聚集一大批学有专攻的著名学者，风云际会，开创了复旦中文系历史上最好

的学术局面。这其中陈望道教授之于中国语法修辞研究、郭绍虞教授之于古代语言文学和批评史的研究、朱东润教授之于古代文学和传记文学的研究、陈子展教授之于先秦文学和近代文学史的研究、王欣夫教授之于文献书目学研究、吴文祺教授之于古代汉语研究、赵景深教授之于戏剧和通俗文艺研究、张世禄教授之于古代汉语史研究、蒋天枢教授之于清代学术研究和《楚辞》研究、刘大杰教授之于中国文学史研究等,形成了中文系“十老”的语言文学治学传统,皆足代表当时的学术水平。半个世纪风雨路,江山代有才人出,1980年代以来,中文系在“十老”治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国语法修辞研究等特色传统,建立起几代专家学者组合而成的学术梯队;同时,贾植芳教授为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建设奠定基础,胡裕树教授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蒋孔阳教授在西方美学研究领域都有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因此,对这些前辈学者的学术贡献和治学方法进行研究总结,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乙种本为对复旦大学文学社团和复旦中文系有特色、有影响的学科传统的系列研究,其中包括“复旦剧社与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复旦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研究”、“复旦中国文学史传统研究”、“陈望道对复旦语法修辞学科的贡献”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复旦剧社是全国话剧领域颇有盛名的话剧社团,它在洪深、朱端钧等前辈戏剧家的领导下,对中国现代话剧运动曾做出过较大的贡献,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历来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研究的强项,不仅编著出版多部有影响的文学史、批评史的著作,而且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学科传统,形成了较为强势的学术梯队,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陈望道先生所著《修辞学发凡》是中国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在此基础上复旦的修辞学研究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学科。

上述专题研究的论文作者,基本上是中文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授予项目,每位作者都配备了专门的指导老师,给予具体指导。这些论文的作者都能做到认真查阅、收集资料,对所承担的课题做深入研究,在学理层面上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尽管这些见解未必都很准确,学术水平也高低不齐,但其分析评述有理有据,

有些论文还提出了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学术见解,这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他们来说,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前辈学者的人格精神和治学经验,无疑是一笔宝贵财富,值得认真学习和继承借鉴。

从中文系学术委员会确定选题到招标确定作者,从完成论文写到编辑丛书出版,时间有两年左右,但由于经验不足,整个工作仍然处于比较紧迫的状态下面运行。其中有几个选题因为完成得不够理想而不得不暂时空缺。陈望道教授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理论的传播者之一,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并且对中国语法修辞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丛书乙种本专门收入《陈望道对中国语法修辞研究的贡献》一书,有详尽论述,为了避免过多重复,故而在甲种本的简易传论里未予收录,特此说明。整个工作中,由于时间迫切,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专家学者和读者诸君批评指正。该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郑纳新先生花了大量的心血,为的是及时赶在复旦校庆前出版。在此也表示衷心感谢。

陈思和 周斌

2005年8月

绪 论

本书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为迎接百年校庆而规划的研究课题之一，作为校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对复旦文学史写作传统进行过认真系统的梳理与总结。本书旨在对复旦文学史写作传统作系统的研究，力求揭示其个别的和传承整体的特点，并进而对文学史写作和文学史理论作深入的探讨，以求有助于文学史学科的理论建设。

复旦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百年来，文学史名家辈出。顾实、刘大白、赵景深、陈子展、卢冀野、刘大杰等都是解放前名重一时的文学史家。他们当中，如顾实、刘大白长期浸淫于旧文学之中，是从旧营垒里走出来的“新人”，在他们力求破旧立新的文学史著作里，旧的思想观念不时地流露出来，他们的文学史带有很浓厚的新旧蜕变的痕迹，然而又与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写作特征有了很大的区别，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赵景深、陈子展、张世禄、卢冀野、吴文祺、刘大杰等虽说是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但是他们所走的道路却不相同。陈子展、张世禄、卢冀野在反封建传统文化腐朽性的同时，又对传统文化保持冷静审视态度，对其进行系统梳理，以期能从中有所发现、有所借鉴。赵景深、吴文祺、刘大杰在反封建传统文化、整理传统文化的同时，自觉把关注的焦点投注于急速变动的社会大潮中，以期能从现实中汲取不断创新的源泉。这说明了社会思潮运动的复杂性，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在反抗中有分化与融合，在前进中

也会有暂时的回归——融合与暂时回归并非落后、保守,而是为了更理性、稳重地前进;继续前进者也不是激进浮躁,而是为了不断探索新生之路。复旦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史家们,在复杂的社会背景里,对繁富的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具体做法,无论是同还是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在研究文学发展规律过程中的严谨态度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则是一致的。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社会思潮急剧“左”倾及社会意识形态主宰一切的大背景下,复旦的文学史写作也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欲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阶级斗争理念,分析整理传统文化及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这种急欲改天换地的良好愿望及盲目自信、乐观的态度,使文学史写作成为典型的急功近利思想的宣传品。1980年代以后,复旦文学史撰写者们发挥解放前文学史家们的扎实严谨以及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经过十多年的积累与沉思,到了1990年代迎来了文学史写作的喷发期,各种类型的文学史著作纷纷面世,如七彩礼花,绚烂壮观。最具有轰动效应和学理价值的是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众多文学史著作纷纷抢占了各个领域文学史写作的制高点,如陈左高的《中国日记史略》,首开了以日记创作为研究对象的日记史先河,徐志嘯的《中国比较文学简史》在填补该领域的研究空白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鲜明的个性色彩驰誉文坛,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世纪文学通史》把20世纪文学在文学史观、体例、内容、文体等方面作为一个系统整体贯通起来,蒋凡的《故事本中国文学史》是趣味化文学史写作的深入探索之作……这些作品,是复旦文学史家们继承了前辈稳重扎实而又不断锐意创新的精神体现。经过几十年的薪火相传,这种精神已化为复旦文学史写作最重要的精神传统。

复旦文学史写作不仅个人成果十分突出,而且复旦人也参与了国家组织的教科书编写工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九十年代,两次“中国文学史”写作,复旦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五六十年代的编写,刘大杰参与了大纲的拟定;九十年代的编写,黄霖负责明代文学的工作。可以这么说,复旦的文学史写作为配合中国的文学史写作做出

了重要贡献。

我们在这里指出复旦文学史写作的特殊地位和贡献时,旨在说明,复旦文学史写作是与中国的文学史写作发展历程紧密相连的。对复旦这20本左右的文学史著的研究,首先通过对它们的撰写考察中,可以窥见中国各高校、研究所或集体和个人撰写的文学史发展脉络和成就。其次研究复旦人近百年来关于文学史传统的传承和长期师生相传所形成的复旦学风,我们也可以从文学史的写作理论中,看出复旦文学史的独特光彩。

复旦文学史的独特传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那就是教师对撰写文学史的高度重视,注重文学史研究的学理性,充分展现个性特征并在融会中外思潮中努力创新。

复旦文学史大都是教师的上课讲义,自从刘大白在复旦任教、写文学史以来,许多教师都继承了这个传统,因为文学史对他们来说,不仅仅只是史的描绘,而且是多年教学经验的积累和个人研究成果的结晶。他们注重把这种心血结晶凝聚起来,使之成为代代相传的传统,因此,复旦的文学史写作名家不断涌现。现在复旦文学史写作正向各研究领域不断渗透、深入,可以预见,将会有更多、更有创见的文学史著作问世。

对学理性的重视,是复旦文学史传统的第二方面。写史乃是郑重、严肃之事,是深邃的理论洞察力和学术研究的严谨客观性的有机结合,这是复旦文学史撰者的自觉追求。刘大白以其博学多才和广泛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写成的文学史,探索了文学史发展规律及写作方法等多方面问题,直到现在,他那种深刻的理论剖析对我们目前的文学史研究、写作仍有着深远的影响。赵景深即使只有数万言的文学史,却也是在大量阅读研究基础上的思考所得,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论——无论是鸿篇巨著,还是短章小帙,复旦的文学史著者都以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精神认真对待,即使再小的珍珠也能光彩夺目。陈左高的日记史就是这种学理性传统的生动体现。

复旦文学史得以出名,除了富于学理性外,还在于其鲜明的个性。这种鲜明的个性体现在史撰者的史观、体例安排及语言上,给他们所著的文学史佩上了特制的徽章,所以刘大白的“游观”、刘大杰的流丽以

及章培恒的“人性论”等,都是其他文学史著作所没有、同时也不能替代的。这种具有鲜明个性的独特性,并不等于新异。新异乃是以“新”、“奇”为旨归,至于学理性则居其次,而个性的独特乃是长期深入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有学术品格。具有独特学术品格的个性特征,使复旦文学史在众多的文学史著作中备受瞩目。

复旦文学史传统还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那就是凭借其地域优势,得以在融会中外各种思潮中不断创新。上海地处南北之要冲,能萃取南北学术风格之所长。南方学术风格以细致、灵动见长,北方则以宏阔、朴实为主。因此复旦文学史凭着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既有细致、深入的微观剖析,又有厚实、恢弘的宏观把握。同时,上海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要津,外来思潮往往率先在上海登陆,尔后传播开去,这使得复旦人以接触最新动态,始终保持着不断创新的势头,这样,东西南北思潮、学风的碰撞,促使复旦文学史写作获得生生不息的创新动力。

本书研究性质属于学术史范畴,即文学史学史。正如文学史写作一样,文学史学史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最具有理论色彩的方法是“以论带史”,围绕几个中心问题,把复旦的文学史放到各个问题中去论述,这可能与目前已经出版的文学史理论研究著作没什么两样,只不过用的是复旦生产的“原料”罢了。这种写法,理论性强了,而“史”性弱了。考虑到课题的要求,在突出“史”的特征同时,又力求有理论探讨的特色。所以本书在描述复旦文学史写作历程后,主要通过几个重要的个案分析,指出它们各自的优缺点。从感性材料入手,具体分析文学史写作的各种方法及可能碰到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这样既能使人对复旦文学史写作的特征有深刻的印象,又能在文学史研究、写作实践中有所启发。最后一章是对文学史理论的总结,从理论高度来把握文学史写作的规律与原则、方法等方面的问题,突出对文学史观的深入研究,而对于文学史应如何写则不作讨论——因为之前的个案分析已经是很详细的实践性探讨,无需重复。

从全书的框架来看,我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怎么写文学史?为什么文学史会这么写?是大致可以达到预期目标的。在开始本书的论述之前,有必要对两个概念作一界定。

“文学史”，一般指的是文学发展的历程。在这样一个定义里面，其实有两层不同含义。其一是文学的客观发展进程，它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更改的，当然也不可能重新再来，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其二是指研究主体对文学客观发展进程的主观印象，也就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所反映的文学发展历程，它带有人主观性因素，并非等于文学发展历程本身，因而文学史是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的。我们所常说的文学史，其实是指第二层面的内容。因为第一层面的内容存在于作家的作品、言论以及社会各种出版物（包括公开与未公开的）之中，年复一年地堆叠着，它自身并不会自我阐述。不可胜数的文学现象经过长期累积沉淀，成为一大片充满神奇魅力的土地，文学史撰写者如同研究地质的科学家，每个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加以挖掘、采钻，所描述的只是他们各自所见的图景，并不等于文学史现象本身，只是有的人花费工夫甚深，更加接近罢了。角度不同，方法不同，使得文学史的面目与写法也是多姿多彩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地改变中，于是文学史的面目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整个文学史的撰写演变历程来看，它们都是对客观存在的“文学史”的不断接受与阐释罢了。文学史因其客观实在性与主观性、时代性的交融，而使之成为具有永远迷人魅力的研究对象。

“复旦中国文学史”，这是本文所论的对象范围，它指的是由多年或长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老师所写的文学史著作，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和现当代文学史，在形式上则包括所有的通史、断代史及文体史、思潮史、电影史等其他类型的分类文学史。本来按该概念的内涵，甚至还可以包括复旦校友所写的文学史，但因其著者众多，且经历各异，研究的难度相当大，非本书所能胜任。所以采取的范围锁定在教师的著作上。至于外国文学史，也不作为研究重点对象。当然，这里也要顾及到约定俗成的问题，如冯沅君、陆侃如夫妇，曾在复旦大学执教过，因其工作时间短，且传统上是属于山东大学，故不归入复旦中国文学史系列，这是一个特例；另一个则是复旦学生编写的文学史，虽说它是在特定的年代由受教育者自己编写的著作，但其时已有多位教师参与指导，而执笔者又有部分毕业后留校任教，故一并纳入复旦文学史范围。

目录

CONTENTS

丛书总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复旦中国文学史撰写概述	1
第二章 新旧交融的过渡性	23
第一节 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朴学的余绪	23
第二节 刘大白《中国文学史》:文学的导游图	39
第三节 张世禄《中国文艺变迁论》	67
第三章 初步进化史观与实证思想的锋芒	69
第一节 赵景深:通俗化文学史写作的尝试	69
第二节 陈子展:楚狂的风歌	89
第三节 卢冀野:戏曲的传承者	111
第四节 吴文祺《新文学概要》	131
第四章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实证主义文学史的杰作	133
第一节 文学创作	136
第二节 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	147
第三节 文学史写作	155

第四节 文学史的几次修改·····	180
第五章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性的证明·····	189
第一节 人性论观点的揭橥·····	190
第二节 文学史的特点·····	200
第三节 文学史观的强化与修改·····	216
第六章 多种文学史的涌现·····	225
第一节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民间文化形 态的张扬·····	225
第二节 唐金海、周斌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系统 论的三维范式·····	238
第三节 多种体例的文学史·····	250
第七章 复旦中国文学史观·····	270
第一节 文学史观的关键问题·····	270
第二节 复旦中国文学史观的中外文化渊源·····	289
结束语·····	299
参考文献·····	302
后记·····	311

第一章 复旦中国文学史撰写概述

复旦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是中国近百年来文学史写作的缩影。从它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艰难旅程:在风云激荡、改天换地般的时代大潮里,学术史研究也一样在相应的范围内,与民族共同着命运,与国民同享着悲喜。貌似超然物外的学术史,其实质依然是一个民族活生生的心灵史。从早期新旧交融的纯文学与杂文学史观的碰撞,到进化史观与唯物辩证史观的交锋;从意识形态化盛行,统领一切的写作,到回归文学本身,多元史观与百舸争流的盛况。复旦中国文学史写作,折射出我们民族 20 世纪心灵史的隐秘一面。

一、文学史的早期写作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文学史可分为好几个层次,第一层是史料性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运动、现象及相关的社会背景材料,这是最基础的层次;第二层是对作家、作品和人的心灵的探寻,由文本深入到精神层面;第三层则是对整个文学发展历程的规律性把握。文学史的写作也因其定位的层次不同,面目也是千差万别的。

从广义的文学史来看,我国的文学史写作起源相当早,几乎与历史记载同时。从远古的巫官文学到史官文化,都可视为文学史的萌芽,至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以及各类史书的作家传记,各类作品的选集、总集,或各种记载文学评点、作家点滴言行的笔记小说,

等等,都可视为第一层次的文学史。关于作家、作品源流论述、文体兴衰流变等的论述,是文学史更高层次性质的表现,如《文心雕龙·时序》就可算为南北朝以前文学通史概略。后代在这方面的论述也为数不少。

当然,若是从冠以“文学史”这个称呼的著作而言,则是19世纪末的事了。有关中国的文学史写作,最早是从西方开始的。据马汉茂(H. Martin)《欧美文中国文学史介绍》中说,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德国人W. Schott于185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草稿》,1867年A. Wylie的《中国文学注解》,1880年瓦西里耶夫《中国文学史纲要》,日本人古城贞吉(1897)、笹川种郎(1898)等人的《支那文学史》,英国人翟里斯(Herbert A. Giles)的《中国文学史》(1901)。^①西方按章分节的文学史写法,通过日本人之手,辗转传到了中国。中国人自己写的文学史,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完成于1897年,出版于1906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写于1904年,并于当年印成讲义,1907年正式出版。这两本草创文学史都较为简略,字数也不多。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由国学扶轮社印行,共有29册,170多万字之多,是一部巨型的著作。但无论是黄人的巨著,还是林传甲薄薄的数万言小册子,他们都离不开1904年1月颁布的《重定学堂章程》的规定,把文字、训诂、音韵、文章修辞、写作、文体文法、文学与历史、地理、考古等多方面的内容全部都包容进去,把它写成著述史或学术史的模样。其意识形态核心以儒家思想为准,要“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艺能为致用治生之具”^②,即以宗经为主,认为“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③。这个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厘定的《重定学堂章程》,其实还是以“中体

① 转引自董乃斌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注解1。

②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学制》第二册,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9页。

③ 同上,第12页。

西用”为主的教育思想,他们对传统的东西仍十分迷恋,企图以封建传统文化来有条件地吸收西方思想文化。因此撰写文学史者在史观上有这种调和中西方文化的意图。具体表现为传统文化样式为尊、其地位不可动摇的认识倾向,“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①。这就是说,《章程》对经、史、理学及词章之学并不偏废。因国家政策的影响,早期的文学史著作带着浓厚的传统文学史观的气息。因此,早期的文学史写作变成学术史、著述史,并不仅仅只是著述者的思想观念问题,还与国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的大学章程里,把文学与哲学、史学、地理学分开,使中国的教育制度进一步与西方接轨,初步奠定了以后几十年中人文学科的分类格局。^②这是文学与史、哲的第一次剥离。但在文学史撰写上,内容体例与晚清时期并无质的区别,如王梦曾、张之纯、谢无量等人的著作,仍是杂文学史观。文学史的观念还将面临着进一步分裂。

在以上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对复旦大学的课程设置可以有一定的理解,从1914年《复旦公学章程》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国文系其实也是文、史、哲不分的,并不按教育部规定的那样迅速执行。政策从中央颁布到地方的落实,往往要经过一段时期后方能见效。当时国文系的详细科目为: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作论、古文、经、史、子等各部门科目。关于中国地理,用的是中华书局新制本国地理教本,“此科注重自然地理,俾学者知国内之广大富庶,激发其爱国务实之思想,而地方志特略论焉——限于时也”。中国历史“注重文化之增进,政治之良

^①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学制》第二册,第13页。

^② 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97页。